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編 第八冊

漢晉之北族與邊疆史論

王明蓀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8 冊

漢晉之北族與邊疆史論

王 明 蓀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晉之北族與邊疆史論／王明蓀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序 2+ 目 2+142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編：第 8 冊）

ISBN：978-986-254-228-6（精裝）

1. 邊防 2. 歷史 3. 漢代 4. 晉代

599.2092

99012824

ISBN - 978-986-2542-28-6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254-228-6

漢晉之北族與邊疆史論

作 者 王明蓀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35 冊（精裝）新台幣 5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漢晉之北族與邊疆史論

王明蓀 著

作者簡介

王明蓀，祖籍湖北當陽，於 1947 年在安徽蚌埠出生，成長於台灣。1970 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1975 年獲政治大學法學碩士，1983 年獲教育部國家文學博士。曾任教於淡江、中興、佛光大學，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所教授。教學及研究範圍主要在於宋遼金元史、史學與思想史、社會文化史、北方民族史等。出版專書有《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蒙古民族史略》、《中國民族與北疆史論·漢晉篇》、《王安石》、《宋遼金元史》、《遼金元史論文稿》、《宋史論文稿》、《遼金元史學與思想論稿》等十餘種，學術論文八十餘篇；並有關於台灣社區營造、文化資源等文史研究數種。

提 要

本書專論中國北方民族與邊疆之關係，總體而言為歷史上胡漢關係的一部份。主要在於探討自先秦的夷夏分別及邊防政策，至於兩漢形成的北邊政策以及漢晉時期的北疆經營。其次為討論北方諸胡族的逐漸滲透，以及所造成的動亂，與國防問題；又兼及漢晉所承自先秦夷夏觀的發展。故本書所論內容的範圍，起自先秦至於西晉時導致的五胡亂華止。

全書分七章論說，首章為緒論，說明中國史上有長期的胡漢關係，北族生聚之北疆有其考古文化之發現及在歷史上之地位等。第二章討論先秦夷夏的分別以及傳統夷夏觀的形成。第三章論先秦邊防政策的大要，而於兩漢時期逐漸形成的幾種北疆政策及其論點。第四章說明自兩漢漸有北族入居於長城之內，而致於魏晉後有大量的移入。第五章在於分析漢晉時期對北族的和戰、羈縻等政策製訂的過程，並論對北族及邊疆的經營情形。第六章討論自先秦形成的夷夏觀在漢晉時期的發展演進，並略論胡族的生活與民族關係。第七章則為本書的結論。

自序

是書諸章之作，乃環繞國史之民族與北疆爲主題，其時間上爲先秦至漢晉一段時期。國史之民族關係素爲余所重視，蓋中國之民族與文化爲多元形成，歷史之研究實不宜忽略其他之民族，亦不得隨處以漢族之立場唯是。故余近三、四年來，乃選定本書之主題作系列之研究；其中數篇亦曾發表，以求就正於方家。

自余習史以來近二十年，每念父母親大人茹苦教養之恩；蹉跎歲月，幸雙親並在。今書成之際，聊表感恩之情於萬一。是爲之序。

丁卯年仲春明蓀寫于淡水淡江大學

再版序

本書的初版刊行距今已過二十年左右，當時的書名是《中國民族與北疆史論·漢晉篇》；但初版約在十年前已告絕版，不再流行於市面。爲了本書的通行及學術的交流，於是在這次刊行《中國歷史文化研究輯刊》時，應出版社之請，遂有再版的念頭。不過這次再版，對初版的原作並未多作修訂，原因是近十餘年來在教學及研究上較集中於宋遼金元這一段近古時段的歷史，其他範圍則未能有多餘的時間與精力以進行繼續研究，只有暫時擱置。其次，本書探討的課題在於先秦以來至於漢晉時期夷夏觀的形成與演變，以及這段時期對北方民族的政策與北疆經營等，將這二條主軸以史論形式來貫穿，而不在於將漢晉以來與北方民族的各種關係做歷史敘述，因此，即便是近十餘年來有關的論著不少，但對本書而言，並未能產生課題主軸論點的改變，故而增補刪訂似非必要的工作。況且筆者對此一課題不過提出個人的論點以及論述的方式，能否成其說，則有待於學界的檢驗。

在初版寫作當時，對於徵引史料文獻是就手邊的方便而使用，這次再版，除作校對之外，也將徵引史籍、論著、註解形式等作修訂整齊，少部分文字也略作修訂，大體如此。關於北方民族的族源、族屬，以及民族的形成、塑造等，本書中皆不作討論，這些課題應是在另外的專題來探討，故本書僅就史籍所載，將漢晉時期與北族的歷史關係、夷夏觀念等，分別加以處理，看其間歷史的變動，並且企圖引申出五胡十六國登上歷史的舞臺，其來有自，而非突然出現北族的滲透、征服，造成西晉之滅亡及南、北朝局面的形成。

2010年，仲夏，序於華岡



目

次

自序	
再版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論上古的夷夏觀	13
第一節 上古史中的夷與夏	13
第二節 夷夏觀之形成	30
一、生活習俗	32
二、文物制度	33
三、心性	33
第三章 中國北疆政策之初期形成	41
第一節 前言	41
第二節 先秦之邊防政策	44
第三節 北疆政策之初步形成	46
一、主和論	48
二、主戰論	51
三、用夷論	53
四、分別論	57
第四節 小結	58
第四章 胡族之入居與內外動亂	61
第一節 兩漢魏晉時期胡族的入居與南移	61
第二節 胡族與內外動亂	71
第五章 漢晉之北疆經營	81
第一節 由北疆爭霸到推亡固存	81
第二節 安南定北與建安制之形成	92
第六章 漢晉之夷夏觀與民族關係	111
第一節 試析漢晉之夷夏觀	111
一、直接以夷狄爲禽獸	112
二、以夷狄爲困卑彊逆以及畏服強權	114
三、以夷狄有貪圖財利之天性	115
四、其他各種觀點	117
第二節 胡族之生活環境與族群消融	123
第七章 結論	129
引用書目	135
人名索引	143

第一章 緒 論

國史的擴大綿延這一觀點，是現代在國史教學與研究上的重要方向。但不容諱言地，過去所謂國史是以漢族為中心的天下觀，其餘都是「非我族類」的異族或外族，所以國史的範圍就局限於漢族朝廷政制所及之處。元、清兩朝代的建立，往往被視為「中國」的二次亡於外族，不惟元、清之末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號召，在漢族朝廷也以為夷狄之人，應「外而不內，疏而不戚」〔註1〕；這種強調民族的觀點，雖有其政治上的作用，但卻會導致對國史之誤解與偏狹觀念。

國史所述幅員遼闊且年代久遠，單以漢族之興衰是不易見其全貌的，最明顯的是當非漢族治理中國之時，不論是治理中國的全部或部份，通常會被認為是國史中的不幸時代，舉凡壓迫、黑暗、腐敗諸名詞都成為描述這些時期的籠統說法。當漢族與外族訂立條約時，多認為是屈辱含憤之恥；若雙方的戰爭，則多歸咎外族之寇邊貪利為主；如有居於內地的外族變亂，就是因其獸心橫暴之故。上述這些觀點不過就國史中較常見之處而言，至於其他在民族關係、社會、文化等方面皆不乏誤解與偏狹之例，在此暫不敘述。

清代中期以後西洋勢力的臨近日急，中國不得不面對這些新的「蠻夷」，而朝野人士絕大部份秉持著傳統之夷夏觀念，在清初對外的交涉中雖已顯露無遺，但爾後國勢日衰，逼迫日重，不能不求「師夷長技以制夷」；加上邊防所受之威脅，於是展開了對新、舊「蠻夷」之重視與研究。舊有「蠻夷」之研究，就是對邊疆地區的民族、地理、政制、歷史等的探討；與其說是具有

〔註1〕 見《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下諸史者皆為此本），頁32下。

了國史擴大綿延的觀點，毋寧說是新「蠻夷」帶來了較大的刺激，但無論如何已開啓了這擴大綿延的路途；加上民國以來一則爲五族共和之倡導，二則受西方史學之影響，國史的教學與研究就有了新的面貌。

中國民族的構成相當複雜，故而各民族糅合的過程成爲國史發展的重要部份。就史書的記載來看，歷代都有所謂的邊患，五胡與北朝，以及遼、金的分中國而治，到元、清的入主，是古代所說「蠻夷猾夏」最嚴重的結果。不可否認地，這些「戎狄」之禍都在國史之中，故而在教學與研究上，通常有下面幾種方式來處理：第一，在亞洲史、甚至世界史的觀點來看，如對北亞洲民族的移動、蒙古帝國的世界性質等的觀察。第二，就民族史的立場來看，如匈奴史、鮮卑史等包括各民族之歷史、語文、社會等各方面單獨或綜合地觀察。第三，就其在國史上所建立的朝代來看，即前述北朝、遼、金、元、清等斷代史之研究，即所謂「征服王朝」之研究。第四，就各朝代邊疆、國防、對外關係、民族問題等方面來看，這往往也提供了許多民族在中國內外之活動，以及其興起的前景。第五，後一朝代中對前代外族所遺留之問題與影響之觀察，如說隋唐政制中受北朝影響的部份等。以上粗舉數端，即使不提擴大綿延的觀點，已約略可知民族與邊疆問題在國史中之地位。進一步再就國史初期的發展中舉例來看，也可明瞭其比重如何。

夏、商、周三代本身間的民族與文化問題就是上古史中的重點〔註2〕，而在文獻上從黃帝開始至禹時的蚩尤、葷粥、九黎、三苗、蠻夷等都是古史上眾所周知的大事。西周覆亡與犬戎有關，春秋時高唱「尊王攘夷」，是因為「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戎交，中國不絕若線」〔註3〕的背景，而傳統夷夏觀念的形成（詳下章），到晚清都有其影響〔註4〕。至於戰國時的民族與邊疆之重要性，可看《史記》、《漢書》的〈匈奴傳〉即知，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邊於匈奴」。〔註5〕

秦祚短暫之中，今人猶知其修連長城以拒胡，以及蒙恬將大軍北擊匈奴

〔註2〕 參見張光直，〈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67年），頁280～360。

〔註3〕 見《春秋公羊傳》，卷十，〈僖公四年〉（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十三經注疏本，以下所引經書皆此本），頁14上。

〔註4〕 參見楊聯陞著、邢義田譯，〈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食貨月刊》，復刊第二卷第二期（臺北：食貨月刊社，民國61年5月），頁1～8。

〔註5〕 見《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頁6下。

等爲當時的要務，可見其時「胡漢」關係之緊張。從白登之圍到和親政策之遂行，說明了漢初東亞南、北兩大勢力的高低；雙方並正式以長城爲國界〔註6〕。漢武帝討伐匈奴是讀史者皆知之事，而他在國史中地位的顯著，也正與此有密切關係，這裏且不必贅述其經過，但知雙方元氣大傷；《史記》裏對雙方人馬損失有約略的估計，但記載對匈奴的影響則遠不如漢朝廷之詳：

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昌，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其秋（元狩二年）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黎民重困。……其明年（元狩四年），……賞賜五十萬斤，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註7〕

上面這段原文只說明了伐匈奴初期的情形，已經弄到「黎民重困」的地步，無怪乎武帝遭人指責爲竭天下之財以事四夷了。〔註8〕

東漢的匈奴仍是個重大問題，但經過西漢的經歷，逐漸取得優勢。東漢

〔註6〕漢文帝給匈奴單于的國書中說：「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單于）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朕甚嘉之。」既去長城爲界乃循「先帝制」，可知當係高祖時已訂之約，「二國」、「二主」，更明言爲並立之兩國關係。見註5，頁18下、19上。

〔註7〕參見《史記》，記有雙方人馬之損失。本段原文引自卷三十，〈平準書〉，頁3下～9下。

〔註8〕司馬遷說武帝「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見《史記》，〈平準書〉，頁21上。司馬光則以爲武帝之作爲與秦始皇相差無幾，見《資治通鑑》，卷二十二（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1年），頁747。兩史家所論武帝，固不獨指伐匈奴之事，但在外事四夷之中，匈奴問題影響最大則無可疑。

初匈奴分裂，南匈奴款塞稱臣，北匈奴被擊破遠走，到此歷二百餘年總算擺脫來自此北疆的威脅。然而漠北又有新起之鮮卑人取代北匈奴之故地，南匈奴附塞也始終是北疆的民族問題。前者逞強於曹魏與西晉，終而建立北魏；後者即起首五胡亂華，覆亡西晉。於此即不再多述。

東漢雖控制了北疆，但西方又有羌禍與之相終始，兩漢民族與邊疆問題何能不重？史書上說：「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註9〕，到東漢末年時猶有記載說：「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戰戟操矛，挾弓負矢」〔註10〕。寫東漢歷史的范曄，他說西羌的禍亂是這樣的：

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更奉征討之命，……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前後數十巨萬。……

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註11〕

西羌問題竟困弊東漢首尾。再根據近人之研究來看，它確是兩漢除匈奴外，最嚴重的邊疆問題。〔註12〕

漢末三國值天下亂，民族與邊疆皆擾動不安。由於兩漢以來胡人逐漸入居，不止沿邊州郡遍佈，也有散佈在內地中心地區者，這些都成為國內的民族問題，而邊疆似乎永遠有其他民族不斷地再填補進來，民族的移動有如波浪般或大或小的推動。這時期的狀況也日形複雜，類似先秦胡漢雜糅的情形。到此可以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亞洲民族移動的觀察，它也牽連到前面所述及的匈奴移動，這留待後面說明。一個是胡漢勢力消長與醞釀的問題，近代較早對這問題作專題探討的是陳寅恪，他以邊疆民族勢力之消長與唐朝廷之關係來論證，認為外族之盛衰有其連環性之推移，此與中國的外患

〔註9〕 見《後漢書》，卷六十五，〈段熲傳〉，頁26下。

〔註10〕 見前書，卷七十，〈鄭太傳〉，頁3上、下。另見《三國志》，卷十六〈鄭渾傳〉，裴松之注引〈張璠漢記〉，頁23上、下。

〔註11〕 見《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頁40上~42上。

〔註12〕 關於漢代西羌之問題，可參見闕錫曾，〈兩漢的羌患〉，《政治大學學報》，第十四期（臺北：政大，民國55年12月），頁177~216。另見管東貴，〈漢代的羌族〉（上、下篇），《食貨月刊》，復刊第一卷第一、二期（臺北：食貨月刊社，民國60年4~5月），上篇見頁15~20，下篇見頁87~97。另文〈漢代處理羌族問題的辦法的檢討〉，《食貨月刊》，復刊第二卷第三期（民國61年6月），頁129~154。

與內政有密切關連〔註13〕。陳氏雖只舉唐代為例，但同樣的理論正可以用之於整個國史之中。

西方學者衛特福格（K. A. Wittfogel）將秦漢到清分為兩大部份排比，一是典型的中國朝代（Typically Chinese Dynasties），包括秦漢（221B.C.～A.D.220），南朝與北方的中國朝廷，以及隨唐、宋、明等，一是征服和滲透朝代（Dynasties of Conquest and Infiltration），包括北魏及其前後的北方蠻族朝廷，以及遼、金、元、清等；兩部分各佔五個時期〔註14〕。日本學者田村實造在研究中國的征服王朝時，也提及前述衛特福格的說法。他並且指出自遼朝領有燕雲十六州的華北地區，到元朝退出中國地區，共有四三一年，加上清代的二六九年共達七百年，佔了秦統一中國以後二千餘年的三分之一，可見征服王朝實為中國的一環。他又以二大部份來說明北亞民族與漢民族之歷史關係，一是民族移動時期，指五胡（308～439）南北朝（440～588）時期，一是征服王朝時期，指十至十四世紀。〔註15〕

以上舉中、美、日三位學者為例，說明國史中邊疆民族所佔之比重，這只是在歷史發展中一個普通性的鳥瞰，至於這些邊疆民族和漢族間相處之模式，及其對中國文化各方面之影響等，都是相當複雜與廣泛的〔註16〕，這些也是今後繼續研究的重要課題。

關於民族移動方面，通常從國史中民族的分布與遷移來觀察。一般而言，對上古時期的研究較有專題性質，可能是那時中國的民族與文化正在長期的形成之中。秦漢統一之後，「胡漢」之分已明，故民族之移動多在邊疆問題中討論，或者探討入主中國的邊疆民族的先世之時，但對移動的理論作通論性地考察似乎不是這類研究者的主要目的〔註17〕。如果以北疆民族經常寇

〔註13〕 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九思出版社，民國66年第三次修訂版），頁274～304。

〔註14〕 參見 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24-25。

〔註15〕 參見田村實造，《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中國征服王朝にクいて一總括にガ元て一〉（日本：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昭和46年），頁625～655。

〔註16〕 這些方面概略的說明，以及前述二位學者的看法，可參見陶晉生，《邊疆史研究集——宋金時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0年），頁1～15。

〔註17〕 就國史中對民族移動提出通論性地研究，並建立其理論者，在國內如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臺北：正

邊的行爲來看，在過去對這種民族移動的傳統看法就是「天性貪利」之故，顯然這是皮相之言與偏見所造成。

中西學者對於民族移動的看法固不僅限於中國爲對象，但通常都包括了對中國之觀察在內，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之南侵的探討，大體上所提出的理論有下列幾種：（一）氣候變遷說；（二）人口膨脹論；（三）貿易受阻論；（四）生產方式說；（五）強化統治權的政治論；（六）心理上的平等對抗說。這些理論很難取其一爲定論，若作綜合的觀察，應該能得到全面的了解。總之，它已是國際上研究的重點之一。（註18）

在中國邊疆民族的移動方面，就大體而言是由北往南以及由西往東，也有由東往西的移動。前者所造成的波動與結果，要比後者來得嚴重，尤其是進入內地建立政權者全都是來自北方（廣義之北方），故而北疆的騷動也是最大。這一大片地區的民族，在先秦時期有許多倒是由內地往北移的，即被所謂「攘夷」攘走的戎狄，而後他們仍要南下，成爲北疆之患，其中融合有原來生聚於北疆之外的民族，以及由別地移動來的其他民族等，詳細的情形恐怕難以確知。過去對先秦這些民族的考察，通常唯有靠文獻的記載來做探討，而近代以來，由於考古上的發軔，又提供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與看法。

中國民族之形成大半出於蒙古種血統爲其基本成分，但蒙古種有不同之宗派，這些宗派是否在中國境內或鄰近地區完成的，至今仍是個待解決的問題。除去蒙古種外，中國民族在尚未形成期間，已有若干非蒙古種的血統成分散居在中國內外各地，而民族之演變與生活方式之改變是互爲因果的關係，亦即生活方式的一致，可以納入不同之血統；而血統的變化，也能引起生活方式及內容上的變化（註19）。生活方式可以看爲廣義的文化，這就成爲

中書局，民國62年）。

〔註18〕 以上諸理論可參見陶晉生前揭書，頁8。另見蕭啓慶，〈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食貨月刊》，復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臺北：食貨月刊社，民國61年3月），頁1~11。另可參看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 Y. Beacon Press, 1962。W.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影印本）。W.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3，指出五胡亂華與歐亞草原旅移有關，見PP.422~429。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 The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亦論亞洲民族移動問題。

〔註19〕 參見李濟，〈史前文化的鳥瞰〉，收在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上冊（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68年），頁204。關於中國民族問題，可參見芮逸夫，〈中國民族概述〉中四篇論文，見《中國民族及其他文化論稿》，上冊

民族與文化間交互的關係了。

北疆在全國考古資料中是最為貧乏的地區之一，同時尚不易看出經過謹細整理的成果。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北疆有兩個重要的文化區：一是東蒙古地區，二是河套地區。在時代上可分為新石器時代的純粹史前史，以及屬於史前，但多少有文字資料言及可供參考的金屬器時代，也就是有「遠史」(telehistoric)、「近史」(Parahistoric)材料可資利用的時代〔註20〕。先期的概念是以細石器文化代表在北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它除了東蒙古和河套地區外，另有陝西沙苑、東北昂昂溪，並且還向西延申到新疆，同時在長城一帶和仰韶文化接觸〔註21〕。現在且以東蒙古與河套二地區再稍作進一步的說明。〔註22〕

在新石器時代北疆的自然景觀，與現在的乾燥草原有很大的不同，故而發掘的石器中，除去與狩獵採集式生活有關之外，還發現與農耕生活有關的石器，也就可以理解了。由陶片上還可以見到禾本科草葉的痕跡，又有牛羊等家畜的骨骼，是以農牧存在的可能性是極大的。東蒙地區的發掘包括熱河、察哈爾南部和河北的北部，最富代表性的是林西鍋撐子山與赤峰紅山後兩地，而這兩地的文化在東蒙都有相當廣泛的分布。目前認為紅山後文化是鍋撐子山式的東蒙土著細石器文化，是在中原仰韶文化影響下的產物，而鍋撐子山的陶片出土，其紋飾的特徵卻是北歐亞所常見的。另外，在富河溝門發現有十七處房址遺跡，以及卜骨，其陶紋呈現出與北歐亞和北美史前時代的「搖椅式印紋法」(Rocker-stamping)相似形式，這都是極其重要的材料。另外，紅山後文化之發現，對於長城南北的新石器文化關係有很好的線索。〔註23〕

河套重要的遺址集中在其東北角以及西南角兩區。東北角指大青山以南的沿河岸，以清水河縣的白泥窯子文化為代表，它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兩種

(臺北：臺灣藝文印書館，民國61年2月)。

〔註20〕 參見張光直，〈考古學上所見漢代以前的北疆草原地帶〉，《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三本（臺北：中研院，民國60年9月），頁279。

〔註21〕 參見安志敏，〈新石器時代〉，收在《考古學基礎》（臺北：帛書出版社，民國74年），頁34～38。

〔註22〕 以下所述大體按註20，張光直之研究結果。

〔註23〕 參見尹達，《新石器時代》（臺北：坊印本），頁145～146。農耕問題可參見 Kwang-Chin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 press, 1970, pp.351～362。

不同性質的文化，一種具有中原仰韶文化之特點，並且與廟底溝彩陶文化相近似；一種具有山西陝西龍山文化的特徵。目前認為前者要早於後者，而且兩者分別代表了中原仰韶與龍山文化向河套地區的延伸。白泥窯子的兩種文化在河套東北角都有廣泛的發現，所發現的遺物中有細石器文化的成分，西北方很可能是其來源。至於河套西南角是指寧夏東端的黃河沿岸，所發現的材料較少，文化內容也較單純，以細石器為其特徵，間有仰韶與龍山式陶片。

在金屬器時代仍以東蒙與河套來說明。東蒙地區重要的新材料以赤峰附近的夏家店為主，由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可知有發達的農耕與部份的銅業，其石陶器與河北龍山和殷代文化有相似之處，年代上與殷商時期相當。由夏家店上層文化所見之居址與墓葬，可知其時與東北的遼河下游和松花江上游之關係密切；雖然農業是其特徵，但畜牧業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器物中有濃厚的游牧文化色彩的青銅器，可以說明它與北歐亞同時的游牧文化有密切之關係，而它又顯示出有定型的個別文化系統；過去通常把它歸到「河套青銅器」(Qrdos bronzes)類中，顯然是不恰當的。

「河套青銅器」又稱為綏遠式或中國西伯利亞式銅器，它的年代說法差距相當大，又牽涉到北歐亞動物紋美術的起源，與商代青銅美術以及西方青銅美術的關係問題。目前可靠的資料不足，沒有發現可斷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遺址，無從得知這裏的史前土著文化如何產生青銅器文明的歷程，但是可以知道河套在新石器文化之後，曾有一段興盛的青銅器文化，與東蒙的情形相似。

北亞的新石器文化可以分為四類：華北中原文化；中原東北沿太平洋岸北上的太平洋海岸文化；中原文化以北貝加爾湖新石器文化為代表的森林漁獵文化；中原文化西北以鹹海地區的克爾提米那(Keltiminar)文化為代表的草原狩獵文化。以此來看北疆新石器文化，它具有上述四類文化系統特徵的混合，以不同之時空呈現不同的比重。東蒙的鍋撐子山文化顯然有濃厚的北方色彩，但到了紅山後文化時期，它又呈現出濃厚的中原色彩。河套的早晚兩型新石器時代，部份有北方色彩之外，基本上還是中原文化的延伸，但不論如何，它們的新石器文化都具有其地方的特色，不僅僅是各方文化的混合而已。

上面敘述了近人對史前北疆考古上的研究，由於各種代表性的文化有其

地方的特色，也有與其他文化的關連性。若以考古與文獻的互相參考，再將民族與文化關連，可以對新石器時代至商代的情形有部份的概念〔註 24〕。又如周人早期的民族與文化已知與西方的羌族有部份的融合〔註 25〕，像這樣探討的經過應該是研究上古民族的正確方法。

國史中民族與邊疆問題的重要與複雜性正如歷史的洪流一般，時而怒濤洶湧，時或緩和平伏，卻總是一股不止的巨流。北疆及其民族問題成為本文的論點，主要著眼於它在國史中的比重之故。從春秋攘夷、戰國拒胡，到秦漢時期胡漢雙方長期的對抗，大體看來華夏方面的漢族是逐漸佔得了優勢，即使其間有「胡氛」高漲之時，但多半漢族還能保持對抗的均勢，照此長期的發展，何以竟至產生五胡亂華之局面？尤其當北亞強權的匈奴瓦解後，迄魏晉之際，都沒有產生足以替代當年匈奴的強大勢力，這的確是令人深思之問題。本文即述論由先秦至漢晉這一長時期歷史發展的「胡漢關係」，個人以為秦漢與匈奴是亞洲長期對峙的兩大強勢，而在國史中他們彼此的衝突與消融多見於戰爭性質的論文，故而試圖就較理論性質的探討，一則說明秦漢整個時期的各類北疆政策議論；一則透過這些議論，可以提供為明瞭後代對同樣問題的討論基礎。但這種較理論性質的探討，還是要先論述先秦即已產生「非我族類」的觀念，尤其長城之分界並非起於兩漢，對兩個不同天下的意識已在先秦的夷夏觀中表現出來，同樣地，這個夷夏觀也大體支配了中國二千餘年，是不能也不該忽略的。兩漢既已擊破匈奴，國防上之考慮始終存在，而緊接著來的是降胡的民族問題，漢廷著重的是將之一并考慮，降胡的入居與治理漸有趨重之形勢，似乎國內胡漢關係的嚴重性要超過國外了；經過漢末魏晉之發展，終要到一解決的地步。本文所採史論性的研究，為的是要將論述集中在一個假設上：即國史中胡漢關係初期的發展以五胡亂華作一結束，但並不是主觀上胡人要亂華，而歸之於大動亂之所造者；而是在民族融合之勢中，胡人處於夷夏觀念之下力求解放的結果。

外族長期入居，戶口蕃息，其尚武強力依然，如「三晉烏桓為天下名騎」〔註 26〕可知。五胡雜居內地，部份受漢人教育，多得東漢經學之舊傳統，並無當時名士貴族之清談玄理〔註 27〕；他們可將胡漢長期相結合，並得質樸之

〔註 24〕 參見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3 年），頁 12～18。

〔註 25〕 參見前註書，頁 50～53。

〔註 26〕 見《三國志》，卷三十，〈烏丸傳〉，頁 5 上。

〔註 27〕 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3 年修訂十一